

试析徐光启的荒政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 郑二红

中国幅员广大、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跨越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温暖带、温带、寒带等六个地带,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勤劳勇敢的炎黄子孙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由于其辽阔的疆域、复杂的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使之成为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灾荒记载不绝于史书。先民们在与自然抗争中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减灾、救荒思想和措施。

一、中国古代的荒政思想和措施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国家之一。“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元前1766年(商汤十八年)至纪元后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六个月强即罹灾一次。”⁽¹⁾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也并未得到改观,“目前,即使是正常年景,每年约有800个县受灾,2至3亿人口和7亿多亩农作物遭受程度不同的灾害,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最多达800多亿元”⁽²⁾频发的自然灾害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严酷现实的挑战,中国的先民们为谋求生存,逐步产生了天命主义的禳弭论这一救荒思想的原始形态。这种思想来源于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在人类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试图通过祈祷、祭祀、甚至诅咒、恐吓等手段来消除灾难,以求获得丰产和安定生活的一种方式。“直至现代,治灾救荒的思想,虽已逐渐普遍取得科学的根据,或者说救荒思想的科学基础已初步奠立。但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天命主义的禳灾思想的残余还是顽强的存在着。”⁽³⁾显然,天命主义的“禳弭”行为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处理天人关系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它的产生也有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这毕竟是人类早期处理天人之际的一种方式 and 手段,拉开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序幕。

中国历史上的荒政思想到周代已有明确的记载。《周礼》中就有“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月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从中可以清楚看出,我国先民们已经不仅仅依靠禳弭、祈求方式来解决灾荒,而企图运用更多的人为以及社会力量来解决灾荒,从理论与实践上奠定了后世荒政的格局。“如果说,由于史料的缺乏及现有文字材料多为后人追述及至加进以今推古的成份,带有某些不准确性,使西周以前的荒政尚显得轮廓不清,并难以判定的话,中国古代荒政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肯定已出现了雏形。”⁽⁴⁾

所谓荒政,是指政府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政府措施。秦汉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为荒政的实行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尽管秦、汉时期禳弭论仍十分流行,但是,这时无无论是从祭祀、祈祷还是从现实手段解决灾荒已有规范化的趋势。这一时期的荒政思想在上古禳弭论的基础上更付之以阴阳五行来解释,救灾措施诸如蠲免、赈济、移民救粟等也得到初步发展;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常平仓”这一重要的赈灾措施和手段。

到了隋唐两宋时期,关于荒政的朝议更是随处可见,尽管这一时期的荒政思想并未有质的突破,但是在救荒措施方面更趋多样化、定制化。比如,仓储制度除常平仓之外又有义仓、社仓等多种仓储形式。使得这一时期的荒政日臻成熟。元、明两代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渐至鼎盛。

* 本文受河南师范大学校级项目资助,编号为:052117。

古人有“救荒无奇策”的说法,也就是说人们的救灾思想和措施在后代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明、清时代,蠲免、赈济、调粟、借贷、安籍、抚恤等仍然是最主要的措施。后代发展周代的地方在于,明代后期一些荒政措施逐渐法制化,对报灾期限、勘灾事项、赈济数量等方面有了严格的规定,在法律上出现了对灾赈不力者惩罚的规定”。⁽⁵⁾

尽管如此,生活在明末时期徐光启的荒政思想还是有许多不同于古人之处。如徐光启把赈灾看做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站在世界高度主张工农商并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升国力,增强政府和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以及在减灾救荒中运用当时中西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可惜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二、徐光启荒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徐光启,明末杰出的学贯中西的科学巨匠、思想家,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农学、水利等多方面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对农业的贡献尤为显著。徐光启的荒政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完整地保存在他的代表作《农政全书》中。其中徐光启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备荒救灾的问题,共计十八篇,二十五万多字,由此可见他对荒政的重视。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的荒政篇中,收录了大量古代先贤的备荒言论,并引用他老师焦“备荒弭盗,皆今急务,而备荒为尤急。总之,修先王储之政,上也;综中世敛散之规,次也;在所蓄积,均布流通,移粟移民,哀赢益缩,下也。咸无为,而孳孳糜粥之设,是激西江之水,苏涸辙之鱼,蔑有及矣”的观点,在继承的基础上,徐光启进一步提出了“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荒政思想。

“预弭者,浚河筑堤、宽民力、祛民害也”⁽⁶⁾。“浚河筑堤”就是兴修水利。因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来说,水利事业对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鉴于洪涝灾害始终居于各种自然灾害的第一位,旱灾位居第二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徐光启提出了“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⁷⁾的命题,这是其重农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徐光启站在“农政”的高度,解决荒政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为此,他不遗余力翻译了《泰西水法》,把西方的水利思想、措施“拿来”为我所用,体现出徐光启的卓绝眼光。

同时,徐光启鉴于明末天灾人祸不断的实际情况认为,更为重要、带有根本性质的抵御灾害的手段是“宽民力、祛民害”。这更使得他的荒政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农政”高度,即重视农业政策及其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税赋、劳役等方面,以减轻农业、农民的负担,给农业、农民以宽松的环境。为此,徐光启进一步提出必须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宗禄、漕河水利、盐、屯田、边饷、器胜(改良兵器)等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熄灭汹汹燃烧的农民运动之火,进而抵御外族入侵,达到“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的目的,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

难能可贵的是,徐光启不仅提出了问题,且给出了具体而又独具慧眼的解决办法,即运用科学技术的思想,并能把这种思想付诸行动,不遗余力的向西方传教士学习,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有备者,尚蓄积、禁奢侈、设常平、通商贾也”⁽⁸⁾。从中国传统的备荒思想和手段来看,主要包括重农贵粟、仓储备荒、蠲免、赈济、调粟、借贷、安籍、抚恤等内容,其实质是培植国家及其民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所谓“天下非有水旱之可忧,而无水旱之备者为可惧”,是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自然界有其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因自然界自身运动而造成的自然灾害,总是不可避免、时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徐光启给出了积极的回答,提出“为国家而不务蓄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⁹⁾、“未富,未害也”⁽¹⁰⁾等主张,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农业、商业、手工业等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借以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并强调政府更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尽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赈济者,给米煮糜、计户而救之”⁽¹¹⁾。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饥荒乃是最直接的恶果。徐光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给予及时救助。从实践的角度看,“给米煮糜、计户而救之”是封建时期政府最简便易行的措施了。但是徐光启明确指出这是无

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徐光启在继承我国传统减灾救荒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层次分明的“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荒政思想,形成了一个减灾、救荒思想的有机整体,并给出了一套利用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从而为我国传统的救荒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徐光启荒政思想的特点

建立在传统的重农以及减灾救荒思想基础之上的徐光启的荒政思想,与其他古人的减灾、救荒思想和措施相比较,有着鲜明的特色和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农并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眼光

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为本”的国度,重农抑商思想源远流长。徐光启能够超越“重农抑商”的传统窠臼,明确指出“工与贾则农之自出”、“未富,未害也”的观点,即强调“本、末”之间相互依存,“末”可以为“本”服务,不应简单的一概否定的观点。因此他主张对内采用市场调控,平抑粮价,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对外则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正确分析了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倭寇问题。认为“有无相易,邦国之常”,得出“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入寇与通市两事也,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两不相妨也”⁽¹²⁾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结论,体现了徐光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高瞻远瞩的世界高度和眼光。

面对外患不断,天灾连年,经济凋蔽,民怨四起,惶惶不可终日的明王朝,我们不应苛责徐光启个人能够提出像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问题,即使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解决起来恐怕也是不现实的。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徐光启能够敏锐的认识到民不聊生是引起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为农业、农民积极呼吁并多方奔走,努力寻求具体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第二,荒政思想的系统性

在徐光启看来,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腐败,宗禄倍增,农业衰微等一系列问题所造成的人为灾荒是引起民变的直接原因,也使明王朝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想挽救明王朝的败势,必须进行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改革,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当时激烈的党争形势下也是难以开展的。救荒并非和农业生产直接相关,但这对于解决农民实际困难、迅速恢复生产、赢得民心、赢得政治资本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徐光启认为减灾救荒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不仅反映出徐光启的重农思想已经发展到了“农政”的高度,同时也反映出徐光启的务实态度。

徐光启的荒政思想从战略上就是大力发扬传统的重农思想,使农民安守本业,以求逐步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其次在政策上要实行一系列改革,切实做好减轻农业、农民负担的实际工作;再次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给受荒招灾的百姓以生路,并提出运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形成了上中下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有具体的手段和方法的减灾救荒的一个完整有机整体,体现出其荒政思想的系统性。

第三,减灾救灾方法、技术具有浓厚的可操作性 and 现代科技色彩

减灾救荒不仅需要理论作指导,同时也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越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减灾救荒的效果就会越好。徐光启的学生陈子龙评价“其平生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他的减灾救荒措施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治学特色。与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相比,徐光启绝非夸夸而谈,他所提出的减灾救荒方法和措施大都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所得,有理有据,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点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道的。

比如,就与旱涝密切相关的兴修水利工程来说,他集中西经验、思想于一体并加以总结、发挥,提出了用水之法达数十种之多;在《农政全书》荒政篇中,他载录朱彥樞《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谱》两书,借以告诫人们“饥馑之岁,凡木叶草实,皆可以济农”,并将其中在不得已时可作为粮食代用品的河洛秦晋等地野菜亲自尝试达30多种。这种为了获得真知,不顾生命危险亲口尝试的探索精神,令人钦佩。

又比如他对蝗虫、蝗灾的研究,进行水稻的种植试验、推广红薯、棉花栽培技术等等都充满着强烈的现代科技思想和手段。正是这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之成

为驰名中外、当之无愧的科学巨匠。

四、徐光启荒政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从个人角度看,徐光启是不幸的,他生不逢时,聪明才智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呕心沥血经营的科研事业也后继乏人。但是,作为科学巨匠的他,却因留给人类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彪炳史册。他执著的科学精神、博大的科学思想以及立足实际的科学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财富。徐光启的荒政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提出“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荒政思想,即使在文明昌盛、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给我们以启示。

启示一:我们必须把三农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综合国力,借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生产力得以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极大改善。但经济高速发展、文明形态的急剧转型,引发了社会贫富分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伦理道德失范、物价上涨等一系列国内社会问题。其中三农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具有根本性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之一。从政治角度看,三农问题涉及到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执政之基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它关系到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成果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问题;从社会生活角度看,它关系到数亿百姓的生活乃至于生存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社会和谐,甚至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付诸东流。一句话,能否解决好三农问题,迅速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的大事。

另一方面,在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当今世界,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向多极世界格局转化时期,西方不时发出攻击、污蔑、诋毁我国政府和人民形象的杂音和举措。可以预料,随着我国进一步全面发展,在一定时期内这些杂音甚至于更为激烈的冲突,有不可避免、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对于象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东方古国来说,粮食安全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也不能把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大问题依赖于国际社会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预弭为上”的荒政思想警示我们,必须把三农问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切实解决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力争尽快彻底消除国内矛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借以抵御来自西方压力和挑战。

启示二: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

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方近代科技诞生、发展的重要时期,从此科学技术深深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但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自明末传入我国以来,中西文明之间摩擦、冲突几乎从未间断。从明末的“南京教案”、康熙时期的“礼仪之争”、到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运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大讨论等等,时至今日这种冲突仍未停息。这一现象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我们不应否认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无论如何科学技术对于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强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短短几百年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2007与2008年交替之际,我国南方大部分省份遭遇重大雪灾,造成重大损失,引起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再一次敲响了重视自然灾害的警钟。作为一个地域广大、自然灾害频发的发展中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发展现代高科技,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诸多问题。我们别无选择!别无选择!

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工作之中,科学先驱徐光启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值得深思和学习。

启示三: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树立“欲求取胜”的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立足于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精髓,在学习、消化、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创新,才能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具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与振奋民族精神的永恒力量,是我们不能割舍也割舍不断的血脉。二十一世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必然是

继承传统精华、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继承是基础,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创造出再次辉煌的中华民族。但是在近现代史上,就继承与创新这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却走了许多弯路,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也进入关键期。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如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同时在百余年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以更为开阔的胸襟看待西方文明,大力创新,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早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的确,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几百年前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徐光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为传统思想所束缚,能够超越于传统,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坚定的民族自信心,虚心向西方学习,显示了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特殊时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徐光启的宽广胸怀和世界眼光,给我们现时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On the Relieving Policies of Xu Guangqi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ZHENG Er Hong, SHENG Bang Yue

Abstract: China was a country which had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during the long-term struggle with them, we had accumulated a lot of thoughts and taken many measures to reduce disasters and relieve the famine. The thought of relieving policies by Xu Guangqi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thought system to reduce disasters and relieve the famine. He proposed, "Prevention is the best, then the preparation, and relief is the last one". This saying has both theor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owadays.

Key words: Xu Guangq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ieving policies

参考文献:

- (1)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8; 38。
- (2) 李向军:《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 (2)。
- (3)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8; 147。
- (4) 李向军:《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 (2)。
- (5) 陈采勤:《试论《周礼》的荒政思想》[J].《学术月刊》, 1998, (2)。
- (6) 徐光启:《农政全书》[M]. 石声汉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
- (7) 徐光启:《农政全书》[M]. 石声汉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凡例。
- (8) 徐光启:《农政全书》[M]. 石声汉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
- (9) 徐光启:《徐光启集》[M]. 王重民校. 上海:中华书局, 1963, 243。
- (10) 徐光启:《徐光启集》[M]. 王重民校. 上海:中华书局, 1963, 228。
- (11) 徐光启:《农政全书》[M]. 石声汉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
- (12) 徐光启:《徐光启集》[M]. 王重民校. 上海:中华书局, 1963, 47。